

# 當下人文社會科學集刊的生存狀況 及發展策略

陶東風 和 磊

---

**[提要]** 學術集刊的生存和發展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問題。在中國當下的政治文化語境中，集刊往往會受到政治與經濟力量的雙重夾擊。在此情況下，集刊要想獲得生存和發展，首先不應當完全排斥體制，應通過與體制的協商和磨合，為自身贏得一定的政治和經濟保障。但這並不意味著放棄自己的獨立立場。堅持民間立場是學術集刊的立刊之本。其次，集刊要提高自身的學術質量，還需要加強自身的專業化、精品化、國際化，做好選題策劃，特別是對某一領域的重要問題做深度挖掘。最後，集刊的發展還需要學術共同體的支持以及集刊主編的個人學術聲譽和學術公信力。

**[關鍵詞]** 集刊 學術共同體 文化體制 策略

**[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4 - 0128 - 10

---

無可否認，人文社會科學集刊<sup>①</sup>在當代中國的知識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很多集刊發表的論文就學術質量而言絕不在正式刊物之下，乃至不在那些所謂“核心刊物”、“權威刊物”之下。但即便如此，當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集刊的生存狀況仍不令人樂觀。隨著2008年2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出版管理規定》（同年5月1日正式實施），以及2012年7月《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等文件的出臺，人文社會科學集刊的生存問題更加嚴峻地擺在了我們面前，令許多富有學術使命的學者及刊物編輯人員憂心忡忡。本文將通過分析這類期刊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文化語境、特別是制度性語境，關注它們的生存狀況，並嘗試提出這類刊物進一步發展的策略。事實上，這類集刊的生存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當下中國的知識生產狀況。

## 一、集刊創立的文化體制語境

當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集刊的創立，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體制語境。首先，國家對期刊的創辦有著諸多的政策管控。從1988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布《期刊管理暫行規定》起始，中國關於期刊的各種法規、規定、條例、辦法等，不下十幾個，而頒布者除了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之外，還

有國務院、教育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國家科委等部門。這麼多部門出臺如此多的關於期刊的法律法規，可見國家對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視”。其實，法規的出臺更多的是為了強化對期刊的監督與控制，比如國家對刊號實行嚴格控制。2005年的《期刊出版管理規定》就明確規定，創立期刊必須“有符合新聞出版總署認定條件的主管、主辦單位”<sup>④</sup>。單憑這一條，個人申請到刊號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中國，個人辦刊物是很難找到主管、主辦單位的，尤其是主管單位；即便你有單位，而且單位採納了你的意見並申請得到了刊號，它也會成立一個由單位組織的領導班子（一般為“編委會”），並由組織直接任命主編。這樣的刊物不可能成為某一個或幾個學者可以自主控制的學術障地。而且即使由單位申報辦刊，申報成功的概率也很小（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有學者統計，集刊申請到刊號的例子極為罕見<sup>⑤</sup>。由於刊號控制如此之嚴，客觀上使得許多想辦刊的學者或單位只能採取以書代刊的辦法，集刊的出現走的就是這個“曲線救國”之路。這是一種無奈，但也正是在這種無奈中，彰顯了眾多有志於中國學術發展的知識分子的勇氣和擔當。已故著名學者鄧正來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sup>⑥</sup>創刊詞中提出了“直面中國，以學術為本；求索發展，弘理性精神”的辦刊宗旨，他還在《中國書評》（性質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創刊詞中提出了“提升中國社會科學，確立學術批評體系，嚴格學術規範要求”的辦刊宗旨。幾乎所有創辦集刊的主編學者們都懷有這樣的使命和美好的願望（雖然現實並不總如人意）。

其次，就國家出臺的眾多法規來看，其政治和意識形態標準始終是第一位的，報刊出版業的“意識形態屬性”<sup>⑦</sup>不斷被突出強調。同樣主要根據政治和意識形態標準，國家把期刊分為時政類期刊和非時政類期刊（主要包括學術類和娛樂/商業類），前者的辦刊條件遠優於後者。而在這種劃分中，學術期刊受到的重視是最低的，幾乎完全被劃在了非時政類期刊之中（除了一部分黨政刊物之外）。事實上，學術期刊承載著一個國家的知識生產與傳遞，是一個重要的知識生產障地，在建構中國學術傳統和實質性地推進中國學術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sup>⑧</sup>但在這些法規中並沒有給予應有的區分對待（比如與娛樂類加以區分），甚至以“‘小、散、濫’”<sup>⑨</sup>為藉口加強管控。有正式刊號的學術刊物尚且如此，以書代刊的集刊類出版物就更不要說了。

最後，學術集刊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是當下中國的學術評價量化體制，特別是高校職稱評審及科研工作量考核的量化機制所致。這種制度一方面帶來了學術論文的大爆炸，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期刊週期越來越短（經常搞增刊、或把雙月刊改為月刊，月刊改為半月刊）、版本越來越多、頁碼越來越多、字號大小越來越小、文章越來越短等種種“期刊現象”。有學者指出，這些論文膨脹現象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繁榮，而是學術浮躁化和泡沫化的表徵，其根源在於急功近利的學術大躍進思維，而直接原因則主要是為了職稱評定和學位獲取等功利目的。

面對如此惡劣的學術環境，學術界某些有識之士展開了重構學術環境的艱難探索，希望在體制外構建一個嶄新的“學術市場”，實現學術環境的變革。集刊就是這種探索的一種。

由是觀之，集刊的出現，未嘗不是中國學術環境重構的一線生機，<sup>⑩</sup>這也是許多人為集刊叫好的重要原因。<sup>⑪</sup>可以說，儘管辦刊艱難，但經過幾十年的積累，集刊到今天顯然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一股不可忽視的學術力量。這也促使國家相關部門不得不予以正視，不敢一刀切地予以封殺。2005年，周憲教授主持的《人文社會科學集刊調查研究》課題獲得教育部立項（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一般項目）<sup>⑫</sup>，這可以看作是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集刊的合法地位。同年9月

19日，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發函，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集刊的調查，並於2006年8月1日發佈《關於2005年度CSSCI來源集刊遴選結果的公告》，其中被納入CSSCI的來源集刊共33種。2012發佈的CSSCI來源集刊（2012～2013年）增至120種。<sup>①</sup>從中也可以看出集刊發展的速度之快，影響之大。

然而，事情似乎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在期刊主管者眼裡，以書代刊的集刊好像是一個愛打擦邊球、總想逃避管理的頑皮孩子，總擔心“他”會鬧出什麼亂子來，甚至會出現政治性、導向性方面的偏差。<sup>②</sup>果不其然，2010年，韓寒《獨唱團》出事<sup>③</sup>，對以書代刊的出版物的審查再次收緊，全國幾乎興起了一場查辦集刊的運動<sup>④</sup>，有的刊物甚至因此被迫停刊，如《東方叢刊》<sup>⑤</sup>。儘管如此，叢刊依然在艱難中生存著，為人文學科建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 二、集刊發展之路舉要

《文化研究》集刊的創刊完全出於偶然。大約是在1999年的一次會議上，《文化研究》的創辦者（本文第一作者）和幾位對文化研究感興趣的朋友，以及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的史建先生在一起聊天的時候，覺得文化研究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生產領域，歐美國家和港台都有專門的刊物，但大陸卻沒有，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在這種情況下，本文第一作者有意牽頭，朋友們願意寫稿，史建願意出版，於是就做起來了。《文化研究》既沒有掛靠單位，也沒有主辦或主管單位。因此，從創刊伊始大家就明確了《文化研究》的民間的、非體制化的性質，或曰同人性質：沒有主管單位或掛靠單位，沒有編輯部。創辦此刊完全緣於幾個朋友對文化研究有共同興趣，完全沒有名利觀念。從政治立場和學術興趣的角度看，從公共性的角度看，他們更多希望它成為一個公共平台小圈子的喉舌，“左”“右”兼顧。可以說，本著純粹的學術理念辦刊，是很多優秀集刊主編們基本的辦刊宗旨。比如《中國研究》編委會在《發刊詞》中就明確指出，這份刊物屬於全球中國學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間，而不是少數編輯、學者的封閉領地。它將成為面向全球中國學界的開放的學術園地，承擔起海內外學術同仁溝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為促進中國研究領域的日益精進而努力。<sup>⑥</sup>

就具體的學術研究方向而言，《文化研究》在第1輯《前言》中就指出了辦刊的初衷和目的：“介紹國外文化研究的歷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國的文化理論家，翻譯西方文化研究的經典文獻，研討中國當代文化問題（如大眾文化問題、傳媒與公共性問題、後殖民批評問題、民族文化認同與族性政治問題、性別政治問題、文化研究與人文學科重建問題、知識分子角色與功能問題等），考辯西方文化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與運用，探索西方文化理論與中國本土經驗之關係等。”辦刊的宗旨是“介紹西方的文化研究（包括理論家、理論觀點及流派等）與推進中國自己的文化研究並重”<sup>⑦</sup>，而在並重中，更“注重發表以中國為對象的文化研究，尤其注重本土學者的成果”<sup>⑧</sup>。

可以說，文化研究在傳入中國大陸之後，立即顯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響力，對推進中國人文學科自我反思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成為中國人文學科新的知識增長點和理論探索陣地。在這種情況下，創辦《文化研究》這樣的學術期刊，無疑會進一步推進中國的文化研究。但即使是這樣一個懷著美好願望、負載巨大現實意義的學術期刊，其生存和發展同樣面臨重重困難。我們先看下面這張到目前（2013年3月）為止《文化研究》全部14輯的統計表：

輯號	出版社	出版時間	主辦方	受資助情況
1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0年6月	無	無
2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1年4月	無	無
3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2年1月	無	無
4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3年8月	無	無
5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5月	無	無
6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年10月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無
7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年10月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無
8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12月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無
9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年4月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受到首都師範大學 211項目資助
10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年10月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得到南京大學人文 基金資助
11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年6月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封面正式標注為 “CSSCI來源集刊”
12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年5月	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文化研究院資助， 成為院辦刊物
13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3月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	文化研究院資助， 成為院辦刊物
14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3月	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文化研究院資助， 成為院辦刊物

這張表很明晰地呈現出了《文化研究》在編輯、出版過程中的坎坷經歷。首先，出版社一換再換，一共才14輯，但有四家出版社參與出版，其中一家只出版了一期。其次，出版時間不確定。這種不確定雖然與約不到好的稿件有一定關係，但與出版社頻繁更換也緊密相聯。比如在第4輯到第5輯更換出版社之間空了近兩年，2004年一整年就沒有出版。第8輯到第9輯更換出版社之間也有一年多，2009年一整年也沒有出版，不僅無法實現一年出兩輯的最初設想，一年出一輯竟然也難以實現，實在讓人唏噓。再次，主辦方有一定的變化。最初可以說是主編個人集合了一批對文化研究感興趣、希望為文化研究做點事的學者教授，如金元浦教授、高丙中先生一起出版的，帶有明顯的個人色彩。後來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參與進來，主辦過一期，再後來是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與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合辦。2012年，隨著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文化研究》變成了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和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合辦（輪流主辦），並幾乎成為文化研究院的院辦刊物。主辦方的變動一方面與學術聯合有關係，比如身為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的周憲先生在文化研究方面有很高的建樹，他的加入顯然可以增強期刊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設立主辦方的背後有明顯的經濟考慮，尤其是在第9輯之後，刊物有了明確的資金資助，也就是從這輯開始，《文化研究》的出版才算真正走向正常，當年（2010年）就出了兩期，而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更使《文化研究》的出版有了充足的資金保障，僅2013年3月就接連出版了兩期。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研究》所走的路的確不是很平坦，但這絕不是因為論文質量出現了什麼問題。《文化研究》始終把學術質量看得高於一切，寧缺毋濫。事實也雄辯地證明，《文化研究》所刊文章大多數經得住時間考驗。2008年《文化研究》被確定為2008~2009年的CSSCI來源集刊<sup>⑨</sup>，正明確顯示了它的質量。《文化研究》所走不平坦之路的背後，有著深刻的體制方面的原因。作為一本體制外的學術集刊，根本不可能獲得什麼刊號，也很難受到出版社的青睞，這不僅在經濟上出版社基本無利可圖，在當下學術評獎機制下，這樣的體制外的學術集刊也幾乎沒有多大的資源利用價值。由此，出版社不願意接受這本刊物，也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中央編譯出版社同意出版《文化研究》第4輯的時候，主編說了一句感謝的話：“感謝他（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位副社長——引者）的慧眼、膽識和果決。”這樣的感謝讓我們感到，出版社在當今社會出版一份學術期刊似乎成了一件悲壯的事，需要下很大的勇氣。但這份悲壯又何嘗不是許多集刊的共同命運呢？在《文化研究》的第6、7、8輯中，我們陸續體會到了主編們的悲壯乃至感傷。編完第6輯，主編感覺到的是“真累”。在第7輯中，主編直言“《文化研究》叢刊和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一樣走得步履艱難。”就連第一次做主編（第11輯）的周憲先生也覺得近些年來，所做的不少叢書的策劃工作，“都不如《文化研究》執行主編的活兒這麼艱難……沒想到編輯工作是如此耗費精力。”<sup>⑩</sup>

頗具中國特色的是，編輯和出版集刊的艱辛實際上主要體現在與體制的磨合上，這點從《文化研究》不斷變換的合作方及資助來源中就可以看出來。成為首師大文化研究院的院辦刊物之後，《文化研究》顯然也獲得了來自體制內穩定而充足的資金支持。但《文化研究》並沒有因此而失去了其自身的獨立和自由。事實上我們看到，無論是與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合辦，還是成為文化研究院的院辦刊物，《文化研究》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辦刊理念和方向，絕沒有因此而失去其學術獨立性。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體制內未必就不能堅持民間立場，這需要看主編的心胸、膽識以及執著的信念，當然還有策略。

與《文化研究》的命運多舛不同，同為文化研究集刊的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出版的《熱風學術》輯刊（乃至相關的“熱風”系列叢書），出版卻順利得多。《熱風學術》已出版的6輯，除第1輯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外，其他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從第3輯開始，還受到了上海市第三期重點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資助。即便沒有專項資助，相信在文化研究系的支持下，出版也不會有多大問題。這其實也是國內很多集刊生存的一種基本方式，即依託所在的單位或研究基地（特別是教育部掛牌的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辦刊，因為這樣很容易獲得單位或基地的資金支持，刊物也會慢慢成為單位或基地的刊物（正如後來的《文化研究》）。在當下民間資金支持（如企業贊助等）極為欠缺的情況下<sup>⑪</sup>，這或許是一種最簡易的辦刊方式<sup>⑫</sup>。比如在2005年南京大學社會科學評價中心第一次遴選CSSCI集刊中，依託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或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的刊物，就有13種，約占全部33種CSSCI來源集刊的40%。而13種集刊幾乎都是所依託的研究基地的機關刊物；基地反過來又以所辦集刊為中介，有力地促進這些基地本身的學科建設和發展。而CSSCI集刊庫的建立，也進一步激發了這些研究基地建設高水平集刊，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sup>⑬</sup>2006年有學者統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主辦的集刊達到了62種。<sup>⑭</sup>

無論是在沒有主辦單位的情況下隻身艱難前行，還是有了依託後相對從容出版，出版者始終懷著一種對學術的虔誠和執著。而也正由於此，真正用心編輯的集刊在學術界的影響力越來越

大，有的集刊甚至會掀起某一研究領域的學術熱潮，引領中國社會科學的思潮和走向。如上世紀90年代市民社會問題的探討，就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的功勞。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創刊號上，發表了鄧正來和景躍進合寫的《建構中國市民社會》、孫立平的《國家與社會的結構分化》，第3期又刊發了鄧正來的《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架構》，第4期的“主題研討”欄目更是匯集了中外學者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討論的系列文章。此後的第5期、第7期和第8期繼續延續了相關討論。毋庸置疑，“國家與市民社會”研究範式的引入，成了90年代的重大學術事件之一。<sup>⑨</sup>集刊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 三、集刊的發展策略探析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集刊要獲得長足的發展，需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體制內的生存問題，二是資金問題，三是集刊自身的學術質量問題。那麼，在當下中國的學術語境中，集刊要採取何種策略解決這些問題呢？在這裡我們試著提出幾點設想。

首先，從戰略上看，集刊要做到在體制內堅持獨立立場。

在當下中國的社會現實中，作為非正式刊物的集刊必須尋求與體制的結合。這樣做出於以下幾方面的考慮：一是在政治上可以避免一定的風險；二是可以獲得資金支持。兩者都增加了集刊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通過宏觀梳理和個案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集刊最大的劣勢就是沒有體制內的名分。在當下中國，“名不正”必然伴隨著“言不順”。如此，一方面，集刊可能會時不時遭受到來自官方的“關注”；另一方面也會面臨組稿困難的窘境，因為現在很多學者寫文章的目的是為了考核評估，而考核評估的標準與刊物的所謂“級別”是緊密相連的，在所謂“核心刊物”上發表文章會名利雙收，而在集刊（特別是沒有進入CSSCI來源集刊的那部分。即使已經進入CSSCI，很多學校也不承認，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資料》等轉載的可能性也小得多）發表文章，考核時得分很少，甚至根本不算“科研成果”，這就導致了集刊稿源的緊張，特別是名家稿子和好稿子，少而又少，得之殊為不易。如此，集刊在體制和稿源的雙重夾擊下，其生存的艱難可以想見，甚至哪一天會被消掉或自我停刊也說不準。由此，集刊如果與體制結合，既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規避風險，也可以增加稿源。

無法進入體制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辦刊經費匱乏。資金不足，編輯力量不足，幾乎是所有集刊所面臨的學術之外的重要問題，尤其是在創刊之初。比如《文化研究》一直以來都沒有編輯部，沒有專業編輯人員，沒有辦公室，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專門的資金支持（兼職主編的家成了“辦公室”，經常有大批樣書堆放在家裡）。這種情況在其他集刊中也普遍存在。在全社會特別是企業界還沒有形成尊重知識、投資學術期刊的氛圍，辦刊人很難獲得來自民間的資金資助（如企業家贊助）的情況下，進入體制就成為集刊獲得資金支持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辦法。

與此同時，在當下中國，體制也己不再是鐵板一塊，知識人利用體制所讓渡出的空間來做自己的事情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目前集刊紛紛進入體制內，正體現了這一點。但獲取體制內身份並不必然要放棄體制外立場，雖然這裡面有艱難的協商與磨合，也需要“夾縫中求生存”的藝術。本來，集刊和體制離得遠固然給自己帶來了一系列不利因素，但是也因此擁有了自己的最大優勢，這就是受體制的限制少，自主性程度相對較高，主編或以主編為核心的學術圈的學術思想能夠得到更好的貫徹，更能夠按照學術的標準把關，而且學術腐敗的現象相對少，除了出版社最後對稿子把關以外，沒有什麼層層疊疊的審稿制度。對集刊的主辦者而言，重要的是：既然進入

體制並獲得體制的經費資助，同時又不屈從或投降於體制的壓力。不排斥與體制的結合，並能在體制內堅持民間立場，這是集刊所必須要把握的兩個基本策略，是關係到集刊繼續發展的基本原則，而這並不是絕對不可以做到的。

其次，就集刊本身具體的學術質量的把握來看，應該在專業化、精品化、國際化三個方面下功夫。這些都涉及到知識分子的獨立學術追求。

專業化與精品化緊密相關。所謂專業化和精品化，就是要徹底放棄通俗和普及的路子，放棄發行量的考慮，一心一意搞學術精品，以同行的認可、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認可為自己的最高追求目標。具體到某個集刊，就是要吃准一個相對小的專業圈子，做到這個小圈子的人每期必看（由於中國的人口基數大，這個“小圈子”其實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在當下學科分類越來越細的情況下，即使在知識界，想要兼顧各方也是非常困難的（兼顧大眾讀者則根本不可能）。李慶新教授的《海洋史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對於不是這個圈子內的人而言，再通俗、再普及也不會有人買。有學者統計，目前人文學科的集刊幾乎涉及到每門學科，有的學科甚至有很多種，如2012~2013年的CSSCI來源集刊中，單法學學科，就有18種集刊，歷史學也有16種。這些內容並不重複的集刊，幾乎涵蓋了此種學科各個層次，甚至延伸到三級學科，從而具有極強的專業性，進而也可以更好地加強深度研究。<sup>⑥</sup>

與專業化和精品化相關的是主題化，即每一期設定一個或幾個主題，圍繞著主題組稿，這樣就可以對某一主題做更深入和系統的研究。事實上，主題化一直是集刊的優勢所在，因為它對條塊分割的學科體制的依賴性更小，不必考慮學科分類體制及其背後的各種利益集團，而按照主題、專題組織文章，並且可以連續幾期抓住某個主題深入地做，還可以發揮篇幅優勢發表長篇論文乃至三萬字以上（甚至五萬字以上）的超長篇論文。《新國學研究》更是明確以刊發二至十二萬字的長篇學術論文為主<sup>⑦</sup>。這樣，某些集刊實際上類似於一個專題論文集，集中了全國乃至世界學術界關於某個問題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對於那些研究興趣對口的學者而言，這些集刊是非常有保留價值的。這也代表了世界學術發展的趨勢。就《文化研究》來看，目前出版的14輯除第1輯沒有專題之外，其他各輯都有專題，只是有時候主題多一些有時候主題少一些，到目前為止，《文化研究》已經討論過的主要專題包括：視覺文化、身體消費與政治、大眾傳播、影視（影像）、亞文化、粉絲、明星文化、性別、種族、文化機構、空間問題、話語分析、文化記憶、文學與文化、文化與權力、知識分子專題（紀念哈貝馬斯和布迪厄）等。這些專題，幾乎涵蓋了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其中，第8輯幾乎用了整整一期（16篇文章）來探討“文化研究的中國問題與中國視角”，關注文化研究本土化問題；而第10輯除了一篇是“其他”文章外，其餘28篇文章（包括回應的文章）都是關於空間研究的文章，主題明確集中，研究的也就更為深入，這些在傳統學術期刊中是不可能的。其他的學術集刊也幾乎都採取這樣的組稿和編排的方式。

關於國際化問題，一方面，中國的學術期刊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較弱<sup>⑧</sup>，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加強國際合作對於促進中國學術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國內集刊完全可以利用主編的學術影響力及其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與國際期刊或相關領域的國際學者合作，以此提高集刊的學術質量，也可以進一步提升中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事實上我們也看到，目前許多集刊都設有包括外國學者或外籍華人學者在內的編委會，如《文化研究》、《馬克思主義美學》、《跨文化對話》以及《中國社會科學輯刊》等。

第三，尋求學術共同體的承認與認同。

學術集刊的命運與學術共同體休戚相關。一方面，集刊的質量需要得到學術共同體的支持；而另一方面，集刊往往又會以其自身的學術規範和學術操守，促進學術共同體的發展和壯大。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所謂學術共同體，就是從事學術活動的學者們根據共同的學術道德和學術規範和某一專業領域的特殊規範結成的學術組織或團體。這些學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規範，相互尊重、相互聯繫、相互影響，以推動學術發展為己任。也有學者把學術共同體稱之為“學術部落”，並認為不同的學科領域有不同的學術部落，而且相互之間必然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仰及行為方式。<sup>②</sup>

有學者在分析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形成特點時指出，在中國的單位制度下，由於資源並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加上在政治權力本位的制度環境下，單位，即使是學術單位，往往自身也無法保持學術獨立性，因此，在單位內部建立學術共同體非常困難。但這不等於學術共同體沒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恰恰相反，正是由於單位制度的存在，超越單位的學術共同體建構就更為必要，它可以使學者在現實空間之外擁有相對自主的知識生產場域和精神活動空間，保持獨立個體的姿態和立場。<sup>③</sup>體制外或與體制關係並不十分緊密的集刊，在某種意義上承擔著建構中國學術共同體的責任；如果一種集刊成為國內外公認的學術共同體的標誌，那麼，在這個刊物發表文章就意味著獲得了進入該共同體的身份證明。這是很多學者願意給那些學術聲譽良好的集刊（即使不是什麼核心刊物）投稿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集刊的質量和自主性顯然也需要學術共同體的支持。這一點尤其明顯地體現在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評議機制上。學術共同體最根本的特徵是獨立性、自主性，這是同行評議制度運行的載體，也是其存在的前提與基礎。沒有獨立的學術共同體，真正的同行評議是不存在的。一個不健康或不完善的學術共同體同樣不可能有高水平的、令人信賴的同行評議活動；而學術共同體的發展也離不開同行評議。<sup>④</sup>當下中國幾乎所有的集刊都採取匿名評審制度，它所訴諸的就是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評議機制，沒有學術共同體的支持，集刊的公信力顯然會大打折扣。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集刊在建構中國學術共同體的同時，也必須依靠學術共同體的支持，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能否以集刊為核心建立一個高水平的學術共同體，常常取決於主編的影響力和公信度。事實上我們清楚地看到，幾乎每一種集刊，其主編都是某一領域的大家或領軍人物，如我們前面提到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的主編鄧正來、《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主編劉綱紀（現為王傑）、《中國詮釋學》的主編洪漢鼎、《道家文化研究》的主編陳鼓應、《跨文化對話》的主編樂黛雲、《知識分子論叢》的主編許紀霖、《中國教育：研究與評論》的主編丁鋼、《刑法論叢》的主編趙秉志，等等。

事實上，也正因為有這些在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作主編，才使得集刊能夠獲得傳統學術期刊難以獲得的聲譽和知名度，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集刊的學術質量，進而吸引更多的學術共同體的學者向集刊投稿，擴大集刊的聲譽和影響力。當然這也反過來給主編們增加了壓力，促使其不斷提高集刊的質量。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知名學者與集刊及學術共同體一道，共同促進了中國學術的發展，這是一種良性循環，與傳統的學術期刊相比，這是一個很大的優勢。即便主編們感受到累，但這種累也是快樂的，值得的，因為在這其中有他們對發展中國學術的信念、執著和美好的理想！這不正是我們當前學術發展所需要的嗎？



## 簡短的結語

以上的分析也許並不周全，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學術集刊的生存和發展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並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一個經濟問題，一個學者的學術信念問題。集刊是中國特色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方式的產物，它所依託的是中國特色的學術知識生產體制，因此，解剖這種知識生產方式，可以暴露中國知識生產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這都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①“集刊”一般是指沒有正式刊號、以書代刊的連續性出版物，對此大陸有多種不同的稱謂，如“叢刊”、“集刊”、“輯刊”、“論叢”等。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評價中心以“集刊”來指稱這類出版物，這也是較為通用的稱謂，本文據此稱謂，統一稱這類出版物為“集刊”。

②<http://www.gapp.gov.cn/news/1675/110683.shtml>。

③④葉繼元等：《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集刊現狀的調查分析》，北京：《中國出版》，2006年第10期。

④該刊沒有中國大陸的正式刊號，因此不能在大陸通過郵局發行。但它有一個香港的刊號，在中國大陸印製，在書店出售，在同行中贈閱，其實性質和集刊相似。

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http://cyc.ahaas.cn/showart.asp?art\\_id=89](http://cyc.ahaas.cn/showart.asp?art_id=89)。

⑥鄧正來：《中國學術刊物的反思與發展》，北京：《光明日報》，2005年7月28日。

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http://www.gapp.gov.cn/news/1303/87163.shtml>。

⑧于洋：《重構中國學術環境的一線生機——對社會科學ISBN類刊物的評論》，鄧正來主編：《中國書評》，第3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0～121頁。

⑨石灣：《以書代刊：開闢出版新局面》，北京：《中國文化報》，2008年7月8日。

⑩<http://www.sinoss.net/2005/0921/68.html>。

⑪<http://cssci.nju.edu.cn>

⑫肖武：《“以書代刊”兩面觀》，北京：《出版參考》，2001年第10期。

⑬韓寒《獨唱團》停刊雖然並不完全是書報審查的

原因，但審查不過關的確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韓寒曾在一篇《太緊》（[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h2p8.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h2p8.html)）的博文中就指出了審查之緊。後來韓寒雖然解釋《獨唱團》停刊並非相關部門施壓，好像有小人從中作梗，但顯然這不能解釋已經印刷好的一百多萬冊的《獨唱團》第二期被迫銷毀的個中緣由。[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176x6.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176x6.html)

⑭參閱石劍峰：《只出兩期，〈大方〉雜誌被叫停刊》，上海：《東方早報》，2011年11月3日；鄺亮：《“以書代刊”風聲日緊 寫手們為撈一票頂風辦刊》，上海：《青年報》，2011年11月16日；《“以書代刊”出雜誌將被禁止》，[http://book.ifeng.com/shuhua/detail\\_2011\\_11/03/10383446\\_0.shtml](http://book.ifeng.com/shuhua/detail_2011_11/03/10383446_0.shtml)，等等。

⑮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主辦（後又加入了中華美學學會、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等聯合主辦）的《東方叢刊》是1992年創刊的，2008年獲得CSSCI來源集刊，2010年9月在出完第3輯，出版了近20年後停刊。

⑯周曉虹、謝曙光：《中國研究·發刊詞》（2005年春季卷總第1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2頁。

⑰陶東風等主編：《文化研究》（第1輯），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4～5頁。

⑱陶東風等主編：《文化研究》（第2輯），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頁。

⑲參見[http://cssci.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167](http://cssci.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167)。但是因為信息溝通不暢等原因，直到第11期才正式標注“CSSCI來源集刊”字樣。

⑳本節所引主編的話，皆見當期《文化研究》中的《主編的話》。

②①鄧正來當初用香港的刊號主辦《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的時候，還收到了企業家每年10萬元的資助。見鄧正來：《“學在民間”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科學季刊〉與〈中國書評〉的分析》，合肥：《學術界》，2006年第5期。

②②上世紀90年代以後，特別是新世紀以來，資助學術集刊的民間企業也就越少，與此同時，政府財政對於各大學的財政支持明顯加大，出現了集刊領域國進民退的現象。

②③馬曉軍：《2005年度CSSCI來源集刊述略》，南京：《學海》，2007年第2期。

②⑤鄧正來：《“學在民間”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科學季刊〉與〈中國書評〉的分析》，合肥：《學術界》，2006年第5期。

②⑥參閱于麗英：《集刊評述》，哈爾濱：《圖書館建設》，2009年第2期。

②⑦汕頭大學新聞學研究中心編：《新國學研究·編者的話》，第1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頁。

②⑧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中國期刊在國際幾大檢索系統中的數量很少。可參閱中國高校科技期刊研究會的

統計，<http://www.cujs.com/article/UploadPic/2012-12/2012123110252943339.xls>。

②⑨林培錦：《西方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及其與同行評議的關係》，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袁光錘，李福華：《學術共同體的概念及其特徵辨析》，徐州：《煤炭高等教育》，2010年第5期。

③⑩王曉漁：《學術共同體的消逝與重建》，北京：《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4期。

③⑪林培錦：《西方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及其與同行評議的關係》，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作者簡介：**陶東風，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首席專家，《文化研究》集刊主編。北京 100089；和磊，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濟南 250014

[責任編輯 劉澤生]